

12.06

附第1号附录

淮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淮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淮南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前言.....(1)

淮南煤矿史的一些回忆.....胡师童(3)

日寇投降后, 国民党接收淮南煤矿情况.....开茂薰(37)

回忆解放前我同倪荣仙、胡卫中谈判的经过...张剑鸣(55)

解放前保护淮矿档案的回忆片断.....涂岫云遗稿(66)

解放前的淮南铁路.....宁树藩(69)

忆程士范先生与淮南路.....石原皋(76)

程士范、胡卫中与淮南矿路.....宁树藩(84)

解放初期淮南电厂的一些史实.....吴大真(85)

解放前淮南发电厂工人斗争史简述

.....振沂、正起 搜集整理(92)

腥风血雨的大通煤矿万人坑.....周墨兵(99)

日寇血洗三里沟.....刘武汉(106)

日寇占领下的风台县城.....蔡德俊(109)

读者·作者·编者

读者张湘山同志 来 函……………(113)

文 史
通 讯

“老淮南”张光正、路景才、韩景顺来信
摘 录……………(114)

第一辑勘误更正…………… (115)

补白·尾花



前 言

《淮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出版后，在各方面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下，经同志们的辛勤努力和许多老人的热情协助，从新征集到的近二十万字的史料中，选择部分文稿整理编辑成为本辑。

与第一辑比较，本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写亲身经历和熟悉的人和事为主，大部分都是当事人写当年事，间接综合整理的材料较少。

本辑的内容主要有淮南煤矿发展史资料，淮南铁路和电厂史料。目的是想就人们所不甚了解的问题，提供比较可靠的资料。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还选发了一组揭露和控诉日寇侵占淮南和凤台地区烧杀掠抢等滔天罪行的材料。这些内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有一定意义的。

在编辑本辑的过程中，胡师童、亓茂薰、张剑鸣、宁树藩、潘企之、刘峰奇、周墨兵、杨从虎等同志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胡师童高级工程师，不顾年迈，从北京远程赶来淮南参加“淮矿史资料征集座谈会”，并在百忙中亲自为我们撰写二万多字的矿史资料；潘企之教授担负着繁重的教学、科研和行政领导工作，还经常来函协助我们的编辑工作；刘峰奇同志不辞辛劳，认真主持文史资料的审校工作；杨从虎同志带病帮助我们校审稿件。所有这些，都使我们非常感动。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参加本辑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的有宁继武、赵瀛、杨筱平、郑拓、张雷等同志。

由于我们水平低，经验不足，错误和缺点将会不少，敬希读者批评指正，以促使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改进和提高。

编者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

淮南煤矿史的一些回忆

胡 师 童

淮南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南京、上海等工业区较近，是淮河流域最大的煤田，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淮南煤田开采历史悠久，即从1930年官僚资本设立“淮南煤矿局”起，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应淮南市政协的要求，我准备从下面三个方面对淮南煤矿的历史做一些回忆，为编写淮南矿党史和淮南文史提供些参考资料。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通煤矿恢复发展情况

淮南煤矿抗日战争胜利后，是由国民党宋子文的建设银公司派员接收的。由煤矿局付局长谢季纲代行局长职务，正职暂缺。一九四六年，王德滋原任国民党经济部派驻北京办事处专员。国民党政府原准备派他到峰峰煤矿工作。那时峰峰矿区早已为我军解放。王德滋抱有去峰峰的想法，不准备到淮南煤矿来的。由于朱用和将他推荐给宋子文，宋子文在北京和王会面，要求他暂到淮南来主持淮南煤矿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以后有机会再放他去峰峰。这样，一九四六年三月，王德滋就来到了淮南煤矿，任淮南煤矿局局长，直属上海淮南矿路总公司领导。上海总公司董事长朱用和与王德滋有老关系：抗日战争前王曾在浙江、大通两煤矿工作过，卓有成绩，朱对王很赏识。这两个煤矿都有朱的股本，所以朱用和才极力推荐王德滋。王到淮南任局长后，增用了一些较有能力

的人。王在旧社会可以算得上是知人善任，有领导工作能力而事业心很强的人。如早在抗日战争前，原老大通商办煤矿只有王一个工程师和二个助手李境、张少逸。大通矿一、二号立井从设计制图到指挥现场施工，王都亲自干。^① 人员不多，但工作效率很高，工程进度很快。生产的煤炭运到田家庵出售与当时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官办的淮南煤矿竞争，原大通商办煤矿在生产运销各方面获利较当时的淮南煤矿多得多。

王德滋在来淮南之前，通过路景才的介绍认识了张光正。那时张光正是开滦唐山矿的管段工程师。尽管当时开滦工资、物质生活等福利条件远比淮南高，但唐山矿一切工程大权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管段工程师没有这方面的发言权。他由于不愿在外国人统治下工作，甘愿离开开滦煤矿来淮矿工作。为了有机会发挥他个人的作用，张光正向王德滋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在王德滋直接领导下工作，王当即答应并让他担任当时产量潜力较大的大通矿矿长。另任田振宗、何其信为付矿长，李栖凤任工务课长。张光正又选择唐山矿四位有熟练技术的井下工人王春元、顾景岐、孟子荣、薄春柏和他一起来淮南大通矿。这四位老工人曾在唐山矿办的工人业余训练班学习一年，且毕业成绩较为优秀。张光正又向王德滋推荐胡师童。胡师童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到淮南煤矿报到。王德滋任命胡师童为矿务处付处长兼企划课长。企划课是日本占领时期留下的名称，其任务是搞规划、设计、地面地形测量等等。一九四六年底，谢季纲付局长去世后，王德滋推荐胡师童继任付局长。

当时大通煤矿有两口矿井。一号井垂深一百八十米，木制井架，十米高左右。提升绞车为蒸气式的，二百匹马力。

井筒方形，木井圈，木罐道。每次提升两个矿车，每个矿车盛煤四百五十公斤。矿井日产煤能力约五、六百吨。二号立井也是一百八十米深。其井架、绞车、井筒型式与装备和一号井相同。日产煤能力也是五、六百吨。这两个立井的开凿与装备都是王德滋在一九三七年以前设计并建成的。日本占领后，在二号井矿底凿了两个暗井通到二百四十米水平，开采那个水平的煤。所有以上一、二号井的设备，都带有临时性，寿命不可能太长。日本人计划长期掠夺大通煤矿的资源，遂开凿了大通三号立井。圆形井筒，内径六米，计划开凿到垂深三百三十米水平，但只凿到三十米深处，日本就投降了，凿井工程于是停顿下来。王德滋来后任命西北工学院毕业的采矿工程师于公纯负责把三号井凿下去，月进度约三十米，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把三号井凿到三百三十米水平。

王德滋的时间观念强，抓工程进度特别紧。日本人占领时期，大通矿下除二号井底开两个暗井外，没进行什么基本建设。泵房、水仓都很简陋。水量大，水泵常坏，井下经常闹水灾，恢复生产非常困难。一九四六年四月，一、二号井总生产能力虽有千余吨，但日产煤量只有二百多吨。大通矿被看作是淮南的骨干矿井，主要靠它出煤。王德滋很着急，张光正、李栖凤等人都很着急，矿长以下所有技术人员都天天下井。张光正、李栖凤、王春元、顾景岐等人常常在井下连续工作十六小时以上。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日产煤量即超过一千吨。淮南煤矿局为此给大通矿发了奖章，以资鼓励。

大通煤矿在恢复并增加产量的同时，对原有杂乱无章又不合标准的井下工程测量图纸进行了整顿。采用开滦煤矿多年的测量经验，由王柯、丰宗锦负责，开始重新测制比例尺为一比一千的“井上下工程对照图”、“大巷平面图”、

“煤层立面及平面投影图”、“石门地层断面图”等等。这些图纸对指导生产，发现地层地质变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大通矿矿灯房当时很零乱，矿灯数量也不够，影响工人井下安全作业。矿上决定将日本人遗留下来报废的几百盏碱性蓄电池，采用反复“过充电”、“过放电”方法，使之复活应用。又对矿灯房进行技术改造，重新布置，增添灯架，改善照明。工人下井前，从灯房的一侧领灯，升井后从灯房的另一侧交还用过的矿灯，多开窗口，每窗口领灯发灯的灯号都有规定，工人几乎不用排队，秩序井然。每盏矿灯从收回、清刷、上架充电、充电完毕移至待发放的灯架上。从南到北每盏灯走一条最短直线线路，减少了工人的疲劳，灯房工人都高兴。路景才工程师和负责矿灯房的技术员陶立民同有关工人共同努力，按计划按操作规程认真作业。这项改造工作做得很出色，解放后曾把改造大通矿灯房的经验向中央燃料工业部所属煤矿做过介绍。特别是定期用“过充电过放电”保护和延长碱性蓄电池寿命的方法是值得推广的。关于碱性蓄电池的保养和维修曾印有专门小册子上报中央燃料工业部转发各矿做参考。

王德滋来到淮南以后，除了积极恢复生产外，计划迅速把三号井打到三百三十米水平，以后再延伸到四百二十米作下一水平，最后再向五百一十米延深。每个水平高度定为九十米。王德滋指定于公纯工程师负责开凿三号井的工作，同时向上海英商怡和洋行订货，要求该洋行设计并供应三号井井架等装备。一年后即一九四七年秋英商怡和洋行送来了报价单及三号井井架草图，并称交货时间从一九四七年算起要在三年以后。这时我们已着手自己设计井架、井楼、井筒装备了。一千马力蒸汽绞车，根据王德滋的建议，已与开滦签订协议，

将马家沟闲置的蒸汽绞车，作价转让给淮南，由机电课长李颀负责拆迁工作。

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刚到淮南，王德滋就首先问我，大通三号井能不能由我们自己设计并装备起来？我说可以，他很高兴。他当时并未对我透露他们已向上海英商怡和洋行接洽订货并装备三号立井之事。他对我说，那么咱们就自己干吧！接受了这一任务，我马上亲自制图。那时候企划课只有我和徐厚锐，戴翊佐，及另一位描图员共四人。我计划先设计井筒内部装备，其次再设计井架与井楼。当王德滋见我绘制井筒内罐道梁、罐道图纸时，他问我需要助手不？我回答他设计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没有十来个人不行。我所以先设计井筒装备，是为了配合凿井进度，必须确定井筒内罐道梁的位置，以便砌壁时预留梁窝，免得后来在井壁凿洞，又费工，又误时间。王德滋表示同意并答应增加技术人员。不久局里配来唐山工学院采矿系毕业的杨真、董兆鲲两位技术人员。他们未学过金属结构物的设计，完全不懂如何设计井架。我教他们先读英文版本《井架设计》那本书。我清点了材料仓库日本人留下的大型工字钢和重型钢轨，知道可以用来制造井筒内部装备。至于适合井架用的钢材却不多。井架的设计，只有选择钢筋混凝土与钢结构混合型式，以节约钢材。又由于地面井筒周围受过去采空塌陷区及已有建筑物的影响，绞车房只能建在井筒的南侧。但井底车场的装车方向已确定为东西向，井架的天轮不能采用并列式，必须一只在前上方，另一只在后下方，才能与井下向罐笼里装车的方向协调一致。这种型式的井架在我国当时还未见到过，可以称为首创。上述条件确定以后，为了进行井架设计，需要先确定井架的负荷重量。首先确定矿车容量零点八五吨，单层罐笼，每罐同

时装入四个矿车，总煤量为三点四吨，总矸石量则为四吨以上。再加矿车自重，罐笼自重，钢丝绳最大重量等等，得出井架总负荷重量。由杨真、董兆鯤设计金属部分，苏学宽设计井架下部混凝土柱体与上部金属结构结合起来。井架总高由最上部架绳轮（即天轮）轴心线至地平面为三十五米。设计需要三个多月时间。井口出车水平定为高出地平面十米，便于向井下运长料如钢轨等。而上海怡和洋行报来的井架草图是地平面出车，不适用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即使能提前交货亦不能采用。

三号井井楼系钢筋混凝土结构，长约一百米，宽二十二米，建筑面积二千二百平方米。钢屋架跨度二十二米，每五米一个屋架，每架重五吨有余。如上所述，井口出车水平定为高出地面十米，井楼地板水平也随之高出地面十米。生产系统采用矿车自动滑行，自动转辙器，利用爬车机，将空矿车提到应有高度以便利用自滑重返井口，再行装入罐笼送往井下。这一方案是马廷璇提出的。一些阻车器图纸也是他提供的。和当年开滦各矿井采用多层罐笼，井口利用沉车，环行轨道比较，既简单，用人又少，矿车周转率又高，因而也较先进多了。②

井楼全部钢筋混凝土部分，包括柱、梁、楼板、阶梯均由苏学宽工程师设计。一千马力汽绞车房由杨卓成建筑师设计。井架及一切非标准型设备均由九龙岗机厂何学颜、郑雅棠同志负责制造并安装。井筒内罐道梁，罐道等是李鸿勋机械师和大通机厂老工人们安装的。

在施工过程中，井架、绞车房中心线测定，井楼各柱体的具体位置，要求有极准确的测定，徐厚锬、戴翊佐两同志对这项工作完成的很好。土建施工，黄恩果、苏学宽两工程

师亲临现场对进度与质量提供了保证。测绘、运搬及安装一千马力蒸汽绞车，李颀晟、郭东鹤、李鸿勋，以及大通、九龙岗机厂的老工人同志们都出了力。还有许多描图员、施工管理人员、材料供应人员、运输人员等等，参加工作的约有几百人，他们为大通矿三号井建成都做出了贡献。大通矿三号井建设成功，部分地改变了我国三十年代自营煤矿的落后面貌。和当时开滦、抚顺等外国人开办的著名煤矿，在矿井建设的技术方面相比较毫不逊色。上述工程的全部设计与施工都是在已故王德滋局长领导下进行的。一九四六年开始设计，一九四八年十月全部建成投产，前后仅两年多一点时间。

大通三号井设计生产能力为日产三千吨。最高年产量达一百二十余万吨。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第一个四十年代水平的竖井。而且是一次建成一次投产。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通力合作，发扬集体智慧，为祖国在煤炭工业发展史上创造财富的一个典型事例。

二、解放前夕，护矿斗争和迎接解放的一些情况

历史的发展，越来越使我们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日本刚投降时，老百姓由于尚存有传统的正统观念，曾一度对国民党表示过欢迎。但在国民党接收后，不久真象暴露了，有不少人贪污腐化，从抢住房，小汽车到娶小老婆，受贿金条等等现象，非常普遍，越来越不象样子了。人们开始对国民党政府普遍表示不满和失望。

一九四八年八、九月份，淮南附近有了一些小规模游击战斗，淮南煤矿局一部分职员和家属自动疏散到江南一带。不久他们看到时局比较平定，又陆续自动地回到了矿区，闹了一场虚惊。过后不久，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之一，淮海大战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打响了。煤矿局那部分怕打仗的职

员，尤其是江南人，都想把家属先安置到江南去。记得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开滦老同事翁克斋的儿子翁开庆和另一位青年技术员胡庆昌刚到淮南煤矿局，没有上几天班，就带着眷属又回北方去了。当时的淮南矿区真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第一次“疏散列车”组成。“疏散列车”的特点是车上的乘客不必在蚌埠换乘津浦铁路的火车，而是在蚌埠车站整列车过轨，直达南京。愿意搭疏散车走的职员连家属、家俱、粮食、用具都可以装上火车免费运送。九龙岗矿工人们首先听到开“疏散车”的消息，就罢工抗议。九龙岗火车站乱成一团。有的职员被工人从火车上拉下来不叫他们走。工人还把钢轨横在机车前面，阻止火车司机开车。工人代表闯进王德滋局长的办公室，大吵大嚷地说，你们都走了，我们怎么办？谁给我们发工资？你们实在要走，就必须先给我们每个人发三个月工资的疏散费。王德滋、吴竞清（淮南铁路局局长）被工人罢工吓坏了。吴竞清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晚，王德滋对李境和我两位付局长说，他第二天要去上海向总公司请示工作。七日早晨王德滋走了，以后就没有再回来。

在王走以前约是四八年十月底某日，我曾对王德滋说：“淮矿通过两年多的恢复和建设，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我们若是走了，战火烧到矿区时，煤矿会不会被破坏？我们将来的生活会如何呢？南方又没有象样的煤田，我们是干煤矿这一行的，到南方去干什么呢？……”我向王德滋建议，请他留下不走，由他带头组织职工护矿队，保护淮南煤矿，免遭破坏。我当时认为他德高望重，他若肯领头干，不论什么事都好办。不料王德滋回答说：“我倒不是害怕共产党，我是

怕战乱之际，矿区附近的一些土匪强盗会把我们抢光的，并有生命危险啊！这种事（指组织职工护矿队护矿事）我不干……”

我的建议虽被王拒绝了，但我总不死心。王德滋走后，我就和张光正、李栖凤商议组织职工护矿队，既保护了煤矿，也保护了我们自己和家属。共产党来了，总要建设吧！总还要生产煤炭吧！我们干煤炭工业这一行总不会失业吧！张、李听了都认为有道理，表示赞成。那时我虽然40岁了，因为从参加社会工作以来，一向都是搞技术工作，社会人事经验不多，考虑问题不象有些人瞻前顾后，怕这怕那。我认为组织职工武装护矿队可以保护煤矿和我们自身和家属的安全。于是在局里某次的会议上，我提出组织职工武装保护厂矿的建议。有人表示怀疑，职工护矿队能否起作用，但没有人反对。于是决定各矿及电厂都成立职工护矿（厂）队，由各矿（厂）所在地的矿路警察分所长负责操练。煤矿局本部兼顾九龙岗东西两矿，大通和田家庵淮南电厂单独成立护矿（厂）队。九龙岗局本部方刚、苏学宽、杨真等都参加了。护矿（厂）队由矿路警察总所发给枪支和子弹。职工护矿（厂）队开始和矿警一起站岗放哨，夜间担任巡逻任务。据记忆全体护矿队包括九龙岗、大通两矿及电厂总人数不超过一百人，枪支总数不超过五十支。这批力量虽不大，但表明了我们当时坚决留守矿区的决心，对矿路警察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战役开始后，局矿里的一些头头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想坚决留下，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走，很明显共产党是要来接管的，那就给共产党干工作。有的想看看形势，等到最后呆不下去时，再走不迟。想留下的人就必须创造可以安全留下的各种条件，例如修建围墙、整理

电网、组织职工护矿队。以后到蚌埠采购大批小麦、黄豆，为职工准备几个月的粮食，积极处理和解决工人、农民和煤矿局之间的矛盾，警察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应付那些想混水摸鱼，趁火打劫的人等等。保护矿山和电厂，同时也保护了我们自己，正象工人说的要保护自己的“饭碗子”。那时我们并没有什么革命觉悟，真正意识到保护好淮矿和电厂就是支援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早日取得胜利。要走的人中也并非都是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他们只是怕担风险，打算先把家属送走，自己暂留矿区。在这部分要走的人们中间，有的人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工作，例如材料课长钟仁泉，土木科长刘保障，电厂付厂长黄存元等等直到解放前不久还踏踏实实地工作着，对我们保护矿山和电厂起了协助作用。另一部分人则不然，整天不干事，等于消极怠工，什么护矿护厂他们一概不管，只知道执行上海总公司给他们发布的命令，将矿区暂时不用的生产材料及设备向江南抢运！我们决心长期留下来的人，看他们向江南运送物资、器材、设备，虽说是暂时不用的，但过不了多久就会用得上的，心里很着急，不能公开阻拦，只有暗示装卸工人，告诉他们这都是咱们以后生产和生活必需的东西啊！运走了以后我们会有困难的。工人们领会了这种精神，他们能怠工就怠工，能少装运点，就少装运点。有一部分职员想到江西乐平煤矿去工作，那里是总公司新设的一个矿点，要把淮矿物资运一部分到江西乐平去。矛盾发生了！铁路局付局长宁树藩有一天对我说：“我们都要互相关照一些嘛！要走的人应该给要留下来的人以方便，反之，不想走的人也要给要走的人们以方便嘛！”当时情况确实复杂，不好处理。以“疏散车”为导火线，爆发了淮矿工人阶级对属于官僚资本代

理人之间的斗争，长期受淮矿当局欺负的农民也起来要求赔偿他们因采煤坍塌了的房屋和良田。淮南矿区主要负责人王德滋、吴竞清躲在南京，既不敢回矿区，又无颜去上海见总公司的负责人。矿区麻烦事主要是工人要求发相当于三个月工资的“疏散费”。农民要求赔偿田园房屋遭受塌陷的损失。淮南铁路局付局长兼矿路警察所总所长胡卫中对我说：“这都是煤矿工人和与煤矿有关的事，我不懂，农民说采煤塌陷房屋土地也是煤矿的事，请老兄出面应付吧！”工人代表三天二头找我，怕我们溜走，没有人发工资。我向工人代表提出，让他们推派二三个人长驻煤矿局财务处共同掌握保险柜的钥匙。财务开支向他们公开，动用钱财时共同监督。并向他们保证我是坚决不走的。工人们倒很放心，对我很信任，并未派代表来再找麻烦。农民十多个人有一天闯到我的办公室，说煤矿局答应在陈巷子给他们盖新房子的工程已停了下来，大吵大嚷。经过好言安抚，答应督促建筑工程快些进行。土木科长刘保障同志很负责任，亲到现场催办，农民算是暂时不来找麻烦了。这日子真不好过。我不想离开淮矿，不想离开自己亲手组织建成的大通矿三号井，但局势太难应付了，心里想要能快点找到党，给我们指引一条路，帮助我们出主意，想办法，但到哪里去找呢？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或十二月上旬我和胡卫中二人突然接到华东野战军某部负责人的信，这封信并未直接交到我们手里，而是在群众中传阅了好久，以后已成为公开信我才看到。信中指出要求胡卫中和我不要离开矿区，留下来把煤矿保护好……。这封信说明党对淮南煤矿职工和国家资财的关心，它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使我们看到光明前途，有了出路，应该奔向何处去。它使我们坚定了留下来不走保护矿